



Roosevelt AND Hopkins

罗斯福与霍普金斯

——二次大战时期白宫实录

上册

〔美〕舍伍德 著
商务印书馆

罗斯福与霍普金斯

——二次大战时期白宫实录

上 册

〔美〕舍伍德著

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0年·北京

Robert E. 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
AN INTIMATE HISTORY
Harper & Brothers
New York
1950

罗斯福与霍普金斯

——二次大战时期白宫实录

上 册

〔美〕舍伍德著

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850×1168毫米 1/32 193/8印张 464千字
1980年4月第1版 198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6,300册
统一书号: 11017·465 定价: 1.80元

上册目录

修订说明·····	1
序 言·····	3

第一部 1941年以前——霍普金斯所受教育与培养

第 一 章 前 言·····	15
第 二 章 从苏城到华盛顿·····	31
第 三 章 救济计划·····	64
第 四 章 总统欲·····	118
第 五 章 虚张声势的战争·····	181
第 六 章 前海军人员·····	204
第 七 章 连锁反应·····	219
第 八 章 竞选第三任总统·····	239
第 九 章 白 宫·····	282

第二部 1941年——并非空言搪塞

第 十 章 花园浇水管·····	307
第十一章 唐宁街十号·····	319
第十二章 非正式联盟·····	364
第十三章 无限制的紧急状态·····	379
第十四章 向东推进·····	412
第十五章 克里姆林宫·····	438

第十六章	大西洋会议·····	471
第十七章	一发现就开火·····	493
第十八章	援助俄国·····	518
第十九章	太平洋上的战争·····	542
附 注	·····	591

修 订 说 明

1

在我编写本书的漫长过程中，常有人向我询问它的性质，有时会有人反对说：“想必你不致在这段历史的许多重要当事人还在世的时候，发表这些材料吧？”

这意见表现了一种稳重或谨小慎微的态度，幸好它已不合乎今天的潮流。在过去，总统、将军和其他要人的后嗣，往往把私人文件封存数年以至数代之久，有的甚至干脆予以销毁。现在，这些后嗣对他们所继承的文件，依法仍然有权按照他们的意愿自行处理，但是大势所趋，这种扣压办法已为人所不齿。富兰克林·D·罗斯福开创了一个合理的先例，把他多达数百万宗的书信文件遗赠给了国家，而不是交给他的家属，公众要查阅这些文件，必须得到正式负有这方面责任的美国档案馆馆长的批准。

看来倒应该在许多主要人物还没去世的时候，最大限度地公布所有的材料，以便这些人能有机会表示异议，纠正讹传的事实，或者提供不同的解释。

本书就正是这样的，它起初于1948年10月在美国和英国出版，接着又在其他国家印行。我收到的信，读到的书评和文章，不计其数，其中有些便是由亲身参加过本书记载的事件因而熟知内情的人写的，还有些人则接触过正式的文件。我与有资格向我查询书中各项叙述的依据的人，作了无数次谈话。此外，过去十八个月中，大量有关的书籍已陆续问世，其中有丘吉尔的回忆录的前两卷（第三卷正在连载发表），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的《远征欧陆》，埃莉诺·罗斯福的《我的回忆》，格雷斯·塔利的《我的上司罗

1

斯福》，小爱德华·R·斯退丁纽斯的《罗斯福与俄国人》，以及塞缪尔·I·罗森曼编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公事文件和讲话》的最后四卷。

- 2 如果我在本书中有过错误，不论大小，已有充裕的时间和机会来暴露它们。因此，哈珀公司决定出版这个增订版，其中包括根据可靠资料所做的一些订正或补充的新材料。所有这些增加的材料，都编在本书后面的附注中。书的正文没有改动，只是把新发现的很少几处误印和我原来在日期和专有名词拼写方面发生的一些错误改正了。

有几次，正式获得批准的人曾来要求查阅哈里·霍普金斯的某些遗存文件，这些要求得到了满足。1949年12月，出现了一些极不负责任的消息，指责霍普金斯曾把原子弹的秘密“双手奉献”给俄国人。因此，霍普金斯文件中凡是有关原子弹计划的部分，都曾以影印复制本，提交给国会原子能联合委员会主席布里恩·麦克马洪参议员。

霍普金斯的全部书信文件，现在已由他的子女移交给海德公园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图书馆。它们将与罗斯福的文件一起，成为美国人民的财富。未来的研究者可以从那里查到本书据以写作的基本材料的每一个字。

R·E·舍伍德

1950年2月5日

序 言

3

富兰克林·D·罗斯福逝世之后，可以说，凡是与他有过任何关系的人，无不立即收到了编辑和出版商的来信，建议他们写回忆录——现在，真凭实据明摆着：这些建议大多被接受了。我想，恐怕从来还没有哪一个人，他的生平和他所处的时代是如此迅速地
被写进如此大量的书籍中。

我自己并不想给已经够满的书架，再增添负担。我自己保有一些珍贵的、不可磨灭的回忆和1940—1945年间留下的一些未加整理的、芜杂的记录，我原打算不拘形式地把它们写下来，赠给海德公园镇的罗斯福图书馆，保存在那里，供未来的传记作者们的不时之需，因为我知道，我们对亚伯拉罕·林肯的了解，多半是靠当时一些不太重要的人物留下的一鳞半爪的记载。

我听说，哈里·霍普金斯在计划写一本书——确实，在罗斯福去世前几个月，他同我讲过这件事，并且当时已开始与出版商接洽此事。1945年夏、秋两季，我偶然看到他，听他的口气，似乎他已着手进行，我热烈等待着它的问世。那时我还不知道，但后来获悉，他指望在写作上获得他的朋友雷蒙德·斯温^①的帮助。11月，我最后一次见到霍普金斯，然后前往好莱坞，为塞缪尔·戈尔德温^②制作电影《我们一生中的最好年月》（这片名对未来充满希望，认为昔不如今）。当戴维·霍普金斯打电话通知我，他父亲逝世的消息时，我是在戈尔德温的电影厂里；过了大约一个星期，路易斯·

① 美国的新闻记者和作家。——译者

② 美国著名电影制片商，米高梅电影公司的创办人。——译者

霍普金斯从纽约打电话问我，我是否愿意续完那本书。我说，为了纪念哈里，我愿意做我所能做的一切，但是我不清楚，这项工作要包括些什么。我知道，这本书的内容限于战争年代，那正是我与罗斯福和霍普金斯接触最多的时期，但是我不知道这本书采取什么形式，也不知道霍普金斯业已完成多少，他写的东西有多少是根据回忆，又有多少是根据文献材料的。很明显，我不能弄虚作假，冒充这本书全是霍普金斯写的；我当时还想到，我可以先插进这样一句拙劣的自白：“写到这里，霍普金斯故去了，因此以下关于他的这些记载，只能是一些片断的记录了。”过了几个星期，我结束了好莱坞的工作，回到纽约，我发现，霍普金斯连“第一章”这几个字都没写下，然而文献材料却堆积如山。在霍普金斯家里，大约有四十个塞得满满的文件柜，还有许多文件放在一个仓库里，那是新政年代的纪录，这部分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幸好霍普金斯请了一个助手西德尼·海曼，这人花了八个月的时间，把文件分门别类，在文件夹上标明了“卡萨布兰卡会议”，“援助俄国——1943年”等等，因此在我专心阅读它们的几个月中，我可以按年代进行，并有了一个如何进行叙述的初步概念。我还能开始看到，记录中哪些地方有遗漏，哪些部分对我来说是模糊或混乱的，因此我决定，我必须会见一些人，尽量对情况了解得更充分，更明确。于是，我出去旅行，和别人通信，这些工作本来估计至多花上一年时间，结果足足进行了两年半，而且早晚和午间都极少休息。

第一次阅读那些文件，使我的心情十分激动，我必须承认，这种不平静的感觉，一直贯穿在整个写作过程中。因为在我接近最高当局的时候，我的心头曾积累下许多问题，而如今许多问题都已找到答案了；在我注意到的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的情绪以及言行中，有许多使我不解的地方，如今有不少都获得了解决。本来我希望在写本书时，完全不受个人情感所左右，但我越来越发现，我不能

丢开自己的回忆——那些我打算不拘形式地写下来的东西——以及随着阅读那些文件而重新记起的许多往事；当然，跟我谈过话的人，他们的回忆也掺入了我的回忆中。

我原觉得，我只能把这本书写成霍普金斯在大战年代的传记，前面加一篇引言，介绍他在直接参与世界大事之前，包括新政时期的经历。因为1940年以前的事，我完全不能凭借从私人接触中了解到的情况来写，但是后来我对他的经历的探索，远远超过了我原来的打算，这主要由于我出自好奇心，想知道一个出身如此卑微，对出任要职从未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是怎样登上他那种特殊地位的。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这就是我认识到，新政在很大的程度上，为罗斯福和霍普金斯，事实上是为全体美国人民，准备了条件，使他们能够作出那全球战争所需要的巨大努力。为了对抗强大的恶势力，人们在开始意识到也需要借助于坦克、轰炸机和航空母舰之前，先得有精神准备。对霍普金斯说来，新政尤其起了理想的战斗训练作用，因为那时他的生活就是一系列激烈的斗争：与遍布各地的苦难斗，与自然灾害斗，与地方上的官僚政客斗，与其他政府机构斗，与报界和国会的许许多多批评者——他们总是对他的费用浩繁的救济计划横加指责——斗。对我来说，幸运的是他保存了——也可能是他的各位秘书替他保存的——大量有关他自己的剪报簿，从他到达华盛顿的第一天起，凡是报上载有关于他的议论都被剪贴下来了。这些剪报簿上，贴满了十二年来一直未停对他进行的诬蔑，有些对霍普金斯的打击之大和刺激之深，已远远超过了他所愿意承认的程度。但是可以说，他仍然始终相信，对他或任何其他人进行这种攻击的自由权利，正是为民主政治的血液输送氧气的红血球。他已用他自己写下的话（在谈到与俄国的未来关系时）表现了他的这种深刻信念，这些话载在本书最后一章中。

我在写本书时，不得不经常回顾过去，这使我看到，报纸上所表现的对罗斯福政府的敌对情绪，对他来说，绝大部分倒是必要的，这与其说是一种阻力，不如说是一种鼓舞，如果没有这一切，他就不会成为他那样的一位总统。在唯唯诺诺、阿谀奉承的气氛中，他不可能获得发展。

在对霍普金斯的所有攻击中，最使他生气和惊愕的，也许就是那无中生有的指责，说他在1943年秋，曾在白宫进行幕后策划，要把马歇尔将军调离参谋长职位，对他来个“明升暗降”，派往欧洲担任一名闲散的指挥官（见第三十章）。我对这个问题发生了很大兴趣，因为霍普金斯的文件中，有相当多的材料，说明总统当时所受到的各种压力，然而却没有一份文件说明，在第二次开罗会议上，罗斯福为什么会突然宣布，由艾森豪威尔，而不是由马歇尔，来担任“霸王”作战行动（这是在欧洲的一次主要军事活动，不是什么闲散职务）的最高指挥官。我力图找出这一重大决定的主要原因。我前往华盛顿，访问了海军上将金。他把他所记得的一切，原原本本告诉了我（他还为我写这本书，提供了大量极有价值的情况和线索）。我还访问了劳伦斯·斯坦哈特、约翰·J·麦克洛伊和刘易斯·道格拉斯，这三人都参加过开罗会议；还访问了艾夫里尔·哈里曼和查尔斯·E·波伦，他们都参加了那次会议之前的德黑兰会议。我收到了“幸运儿”·阿诺德将军^①的书面材料。我到英国去拜访温斯顿·丘吉尔，他对我提出的问题单所作的答复，共有十四页打字纸，接着我还与他会晤了三次。我访问了丘吉尔的参谋长、爵士黑斯廷斯·伊斯梅将军（后为伊斯梅勋爵），以及安东尼·艾登、比弗布鲁克勋爵、布伦丹·布雷肯和丘吉尔的其他许多同僚。我就这个问题和其他许多问题，与约翰·G·怀南特作了长

^① 即亨利·哈利·阿诺德，1942—1946年间的美军空军司令，“幸运儿”是他的诨名。——译者

谈。后来我又向亨利·L·史汀生、李海海军上将和艾森豪威尔将军征求意见，请他们谈了他们所知道的关于“霸王”指挥官的决定的背景。最后，在1947年初，马歇尔将军从中国回来，我也获得了他提供的材料，他这时担任国务卿，继续为祖国作出杰出的贡献。

在这一件事上，我所获得的材料都是彼此不同的，虽然它们决不是互相排斥的。这次调查正如其他调查一样，使我得到一个结论，即谁也不会知道，在罗斯福复杂的内心活动中，究竟是什么促使他作出他的最后决定。

我着手这部书的工作后不久，杜鲁门总统十分亲切地写信给我，表示他看到“英勇的公仆，已故的哈里·L·霍普金斯的有关材料”即将出版，感到欣慰。总统并说：“如果我能够有所帮助的话，请随时通知我。我还希望，在你执行这一伟大任务时，你能得到你所需要的任何人的最充分的合作。”后来我同总统进行了一次谈话，谈了他跟霍普金斯的关系，那得追溯到1933年，救济计划刚刚开始的时候。不论总统或任何其他政府官员，都没有直接或间接告诉我，我应该讲什么，不应该讲什么，也没有向我提出任何要求或建议，要我删去书中任何一项材料，或降低它的调子。我主动把全部稿件送交国防部，请求审核，这完全是出于军事机密方面的考虑；我必须为我取得的合作，感谢福雷斯特尔部长和他的助手罗伯特·W·贝里海军上校。他们没有要我作任何删节，只是希望我不要直接引用那为数众多的电报，因为逐字公布原文，有可能泄露电码代号。我还把稿件送往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历史资料部，我特别感谢T·B·基特里奇海军上校和他的同事们，他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意见，订正了事实和解释。我还得到格雷丝·塔利小姐，弗兰克·C·沃克，塞缪尔·I·罗森曼，奥布里·威康斯和C·R·汤普森海军中校的大力帮助，他们阅读和校正了原稿，或原稿的一

部分,但是当然,这决不表明他们中任何人应对全书负责任。

一天下午和晚上,承蒙利昂·亨德森^①的好意,为我在华盛顿他的家里,安排了一次会议。会开了大约八个小时,出席的有:罗
7 伯特·克尔,他早在格林尼尔学院时期,就与霍普金斯是莫逆之交;简·霍伊小姐和弗朗西丝·凯利夫人,她们是霍普金斯开始从事纽约市的社会福利工作时,就认识他的,后来在整个新政年代,又一直与他在一起工作;奥布里·威廉斯,伊萨多·卢宾,埃伦·伍德沃德小姐,霍华德·亨特,劳伦斯·韦斯特布鲁克上校,阿瑟·E·戈德施米特夫妇和亨德森,所有这些人都参与过救济计划方面的工作。会上,由西德尼·海曼和我的秘书格雷丝·墨菲小姐作了详细记录,这两人是自始至终参与我写作本书的工作的。这次会议为我打开了了解霍普金斯生平的许多渠道,这方面我本来所知甚少,或一无所知。后来,我与霍普金斯的姊姊艾达·艾梅夫人作过详细的谈话和通信,还与他的第一位夫人埃塞尔·格罗斯·霍普金斯,以及他们的还健在的儿子戴维和罗伯特通过信。我也与哈里的哥哥刘易斯·霍普金斯博士,前格林尼尔学院院长约翰·诺伦博士,以及格林尼尔学院最杰出的教授之一爱德华·A·斯坦纳博士,有过书信联系。我与霍普金斯的不可调和的对手和战友哈罗德·L·伊克斯共进午餐,作了一次非常愉快而极有启发的谈话。

我访问过一次或多次的人,或者通过信的人,为数众多。有些会晤是海曼单独进行的。我理应在此向帮助过我的人——致谢——他们帮助我当然不是因为对我的书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只是希望我的叙述可以尽量准确和完整——但我很抱歉,我只能把他们的姓名按字母顺序作一总的介绍。

^① 美国经济学家,曾任公共工程建设局经济顾问等职。——译者

赫伯特·艾加,约瑟夫·艾尔索普,保罗·阿普尔比,弗兰克·贝恩,伯纳德·M·巴鲁克,比弗布鲁克勋爵,安娜·伯蒂格夫人,路易斯·布朗洛,J·H·伯恩斯将军,万尼瓦尔·布什博士,彻韦尔勋爵,马奎斯·蔡尔兹,格伦维尔·克拉克,本杰明·V·科恩,詹姆斯·B·科南特博士,格兰维尔·康韦海军上校,奥斯卡·考克斯,韦恩·科伊,塞缪尔·H·克罗斯博士,约瑟夫·E·戴维斯,切斯特·戴维斯,克拉伦斯·戴克斯特拉,斯蒂芬·厄尔利,莫里斯·厄恩斯特,赫伯特·伊瓦特博士,菲利普·R·费蒙维尔上校,赫伯特·菲斯,杰罗姆·弗兰克法官,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大法官,詹姆斯·R·富尔顿博士,里查德·V·吉尔伯特,雅各布·戈德堡博士,菲利普·格雷厄姆,哈利法克斯勋爵,罗伯特·汉内甘,威廉·D·哈西特,弗朗西丝·黑德,莱斯利·霍利斯爵士将军,赫谢尔·约翰逊,约翰·金斯伯里,菲奥雷洛·拉瓜迪亚,托马斯·W·拉蒙特,威廉·兰格博士,莱顿勋爵,莱瑟斯勋爵,沃尔特·李普曼,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爵士,奥利弗·利特尔顿,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罗伯特·麦克卢尔将军,罗斯·T·麦金太尔博士,空军联队指挥官D·C·麦金利,约翰·麦克雷海军上将,约翰·E·马斯坦,查尔斯·E·梅里亚姆,詹姆斯·亚历山大·米勒博士,琼·蒙内特,小亨利·摩根索,爱德华·R·默罗,罗伯特·内森,戴维·K·奈尔斯,罗伯特·P·帕特森,弗雷德里克·波兰金,昆廷·雷诺兹,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埃尔莫·罗珀,比尔兹利·鲁姆尔,伯纳德·希尔主教,福雷斯特·谢尔曼海军上将,维克托·肖利斯,哈罗德·史密斯,哈罗德·R·斯塔克海军上将,威廉·斯蒂芬森爵士,爱德华·斯退丁纽斯,罗伯特·斯蒂文斯,雷蒙特·斯温,赫伯特·贝阿德·斯沃普,迈伦·C·泰勒,多萝西·汤普森,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埃德温·M·沃森夫人,萨姆纳·韦尔斯,温德尔·威尔基夫人,阿瑟·威尔逊将军,

艾拉·沃尔弗特。

我还与安德烈·葛罗米柯作过一次简短的谈话。我告诉他，我正在根据已故的哈里·霍普金斯的文件写一本书，我想就这问题，听听苏联当局的意见。他说，这样一本书可能是有益的，不过，也可能没有。

上面列举了我会晤过的人，其中显然缺少一个名字，这就是埃莉诺·罗斯福。在我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见到过她几次，我知道，如果我要求她协助，她是会以她的无可比拟的慷慨给我以帮助的，但是我绝不愿向她提出任何问题，因为她的回忆是属于她自己的，对这些回忆作任何侵扰，都是我所不忍做的。

给过我帮助和指导的人，还有许多只是与我有过偶然的交谈，也有一些是我所不认识的，他们听到我正在写作这部书，便亲切地写信来，告诉我他们与哈里·霍普金斯的接触。当然，我力求把有关罗斯福时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书，统统阅读一遍，这所花的劳动不是很少的，因为有时这一类书好像是平均每天都有一册问世。在艾森豪威尔的回忆录出版之前，丘吉尔的回忆录还没有完成的时候，所有这类书中最好的，据我看，是弗朗西丝·帕金斯的《我所知道的罗斯福》和亨利·L·史汀生与麦乔治·邦迪的《积极为和平和战争工作》。也有一些出版物，我希望，后人不要完全信以为真。

我应该向菲利斯·莫伊尔小姐和伊娃·马克斯夫人表示谢意，她们曾在纽约与墨菲小姐、海曼和我，一起工作过一段时期；我还要向在本书的最后阶段在英国协助我工作的亚历山大·A·惠兰，向萨姆·西蒙以及纽约哈特速记社全体优秀工作人员道谢。我还得感谢露西·米切尔小姐、维克托·萨姆罗克、威廉·菲尔兹，以及剧作家公会的其他同仁，因为他们不仅大力帮助我，而且使我得以长时间离开我正常的本位工作。

在我写作本书之初，我曾考虑，对活着的人是否使用应有的尊⁹称。但我觉得，如我在书中老是写下“罗斯福致电丘吉尔先生”等等，这将显得既累赘又别扭。同样，我尽可能避免提到军衔变动的复杂情况，如“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中校（后为上校，准将，少将，中将，上将，五星上将）”。

至于脚注问题，我作为历史著作和传记的老读者，早已被书页上那些斑斑点点的符号，弄得头昏脑胀，苦不堪言，甚至未老先衰。我的眼光老是给那些星号、剑号以及其他一些难看的小符号，拉到书页底下的小号字上，有时甚至不得不一直看完下几页的底部，然后才回过头来，再从我刚离开的一句话的中段重新往下读。因此，我在本书中大胆排除了脚注的干扰，把所有的注释都移到了书后。但有些文献资料，主要为了说明情况，我还是用括弧插进了一些注文。

我开始写本书时决定，我应该使思想完全集中在我写的这个时期，不让以后的事件对我有所干扰。我觉得，在研究霍普金斯的材料时，我不应让我所作出的一些判断——例如，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急切需要对俄国提供援助——沾染上我那天早晨读到的报纸的任何色彩。后来这事比我预计的容易得多。我难得有机会暂时摆脱令人惊骇而费解的现实，埋头到过去的年代中去，那年月，如赫伯特·艾加所说，是“善良的人敢于彼此信赖”的年代，是“善与恶，恐怖与壮丽都登峰造极，使大多数人惊愕不止”的年代，是“我们的精神和我们的头脑都极度紧张，以致今天还有许多人不相信真有当年那样的生活”的年代。这本书记述了那些年代中的一部分事实，我可以向读者保证，我是按照我所见到的案卷，或者从我的朋友哈里·霍普金斯的文件中所了解到的情况写的，我没有隐瞒任何重要的部分。我希望，这案卷的所有其他部分不久也能公之于世，而且愈快愈好，因为那里包含着许多全世界人民最迫

切地需要吸取的教训。

罗伯特·E·舍伍德